

找 乐

陈建功 著

找 乐

陈建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找乐：陈建功著．—北京：开明出版社，2018.5

ISBN 978-7-5131-4298-4

I．①找… II．①陈… III．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IV．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0371 号

责任编辑：卓玥

找 乐

著 者：陈建功

出 版：开明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)

印 刷：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印 张：11.875

字 数：220 千字

版 次：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5.00 元

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出版社负责调换。联系电话：(010) 88817647

目 录

001 / 找乐

050 / 髻毛

153 / 放生

224 / 耍叉

305 / 前科

找 乐

第一

“找乐子”，是北京的话，也是北京人的“雅好”。北京人爱找乐子，善找乐子。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。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。放放风筝是个乐子。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。即便讲到死吧，人家不说“死”，喜欢说：“听蝈蝈叫去啦！”好像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。

过去天桥有“八大怪”，其中之一叫“大兵黄”。据说当过张勋的“辫子兵”，也算是“英雄末路”吧，每天到天桥撂地儿开骂。三皇五帝他爹，当朝总统他妈，达官显贵他姐，芸芸众生他妹。合辙押韵，句句铿锵，口角飞沫，指天画地。当是时也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喝彩之声迭起，道路为之阻绝。骂者俨然已成富贵骄人。阔步高视，自不待言。听者仿佛也穷儿暴富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。戳在天桥开“骂”和听“骂”，是为一乐儿。

自打乾隆五十五年“四大徽班”进京以后，北京人很少有不会两段“二黄”的了。蹬三轮儿的，卖煎灌肠儿的，把车子担子

往马路边上一搁，扯开嗓子就来一段。这辈子想当诸葛亮是没指望了，时不时“站在城楼观山景”，看一看“司马发来的兵”，倒也威风呢。要不，就“击鼓骂曹”：“平生志气运未通，似蛟龙困在浅水中。有朝一日春雷动，得会风云上九重。”撒一撒胸中的闷气也好。就连那些押去二道坛门吃“黑枣儿”，吐“山里红汤儿”的犯人们，背上插着招子，被五花大绑地扔在驴车上，也要唱一嗓子，招来一片喊好声呢。唱这一嗓子 and 听这一嗓子，也是一个乐子。

咱们北京的百姓们，素有讲个脸面的传统。“耗财买脸儿”，更是一个乐子啦。口袋里镢子儿没有呢，别着急，只管往“大酒缸”里泡就是了。别看不过都是扛窝脖儿的，打执事的，引车卖浆者流，那大爷的派头儿也足着哪。围在酒缸沿儿上，二两烧刀子下肚，哥儿几个便对着拔起脯儿来啦。这位只管说自己如何过五关、斩六将，那位尽管说他的长坂坡。如果素昧平生，刚刚相识，更来劲儿了，反正都是两眼一抹黑，加上一个个喝得红头涨脸，迷迷瞪瞪，只顾沉醉在自己的文韬武略之中，你就是说自己上过月亮，别人也会哼哈哼哈地应和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气宇轩昂地站起来，即便锦囊羞涩，也要端出一副腰缠万贯的神气，吩咐一声“抄！”伙计们赶忙清账，写水牌儿，道一声“记上！”言犹未落，人已经高掌远跂，雍容雅步，踱将出去。这不又是一乐儿吗？

.....

这些，都是老事儿了。世道变了，北京人的日子过得顺心顺

气儿了。可又不能人人顺心、各个顺气儿不是？所以，“找乐子”的“雅好”还是继续下来了。就说街上那些往蛤蟆镜上贴外国商标，往劳动布裤子的屁股后面钉洋文铜牌儿的伙计们吧，那也是一种“找乐子”的法儿，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罢了。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呢，正相反，整天拎个录音机在街上晃，哇喇哇喇招人。问他这干吗哪，他说：“没这个录音机，更没人拿正眼儿看咱们啦！”这又算一种乐子吧？

.....

不过，老事儿也好，新事儿也罢，在高雅之人眼里，都是可笑的。人家也自有人家的道理。本来嘛，你是缝穷的，你就是缝穷的命，唱段“王宝钏”就成“相门之后”啦？扯淡！你是蹬三轮儿的，你就得认头，你说你拉过杨小楼，你还跟他怄了气，把他给摔阴沟里了，治了——人家还是杨小楼，出殡时六十四杠。你呢，还是蹬三轮车儿的，那会儿你要是也出殡，不闹个“穿心杠”就算便宜！甭说把商标贴眼镜儿上，就是贴脑门儿上，你也是“城根儿”的儿子，你也到不了国外！混得不怎么样吧，还老想找点什么乐子找找齐儿，这不瞎掰吗？大概因为这个原因，“找乐儿”者流，就难免不被人引为笑柄了。

其实，你再往深里想想，这有什么可笑的呢？混得不怎么样，再连这么点儿乐和劲儿也没有，还有活头儿吗？据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说法，拿破仑因为个儿矮且有牛皮癣，不顺气儿，所以才有了振长策而驱宇内，君临天下之举。北京的平头百姓们还没想着往拿破仑那份儿上奔呢，只求哥儿几个凑到一块

儿，或位卑言高，称快一时，或击节而歌，乐天知命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由此看来，出轱辘把儿胡同南口向西不远，豌豆街办事处文化活动站那里，每天晚上聚集了一帮老头儿们（也间或有几个老太太来看热闹，几个中年、青年人来凑热闹），一会儿来一折《逍遥津》，一会儿唱一段《打登州》。唱累了，又杂以神吹海聊，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徒弟，他说他和马连良一块儿坐过科……这不仅有民俗的渊源，而且还有心理学上的根据哪。

第二

豌豆街办事处管着周围的十几条胡同，轱辘把儿胡同也在其中。这儿的文化活动站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活动，就是唱。活动站的排演场是过去的仓库，自然是很简陋的，连顶棚也没有，抬头就能看见房顶的椽子像肋条骨似的一根一根码着。水泥地面已经坑洼不平了。顺着四周的墙根儿，一圈一圈地摆着条凳，不管唱的还是听的，杂坐其间。房子中间留着一块巴掌大的空场，又让个火炉占去了一块儿。剩下的地方，只能站下仨俩人儿了。所以清唱还可以，“起霸”，一个人也凑合，如果是“双起霸”，两个人就得撞一块儿去。要是“趟马”，您得留神炉子。好在来“找乐子”的人大多是老头儿，身段就不能讲究啦，满脸的褶子，扮相也罢了。因此，这里从来就没有彩唱过。顶多了，来个“清音桌”，角色多了，有的人还得上座位唱。别看条件差，您要是往这儿一坐，闭上眼睛听一听，有板有眼的，唱得真有那么点子

味儿哪。

老头儿们有点儿爱神吹，这不假。可他们的神吹毕竟还是沾点儿谱的。比如他说他跟马连良一块儿坐过科，那是得一块儿混过几天，至于后来嗓子“倒了仓”，他唱不了了，卖大碗茶去了，那就得再说了。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弟子，说不定也确实，至于以后抽上了大烟，玩物丧志，则另当别论。正因为如此，大多数都是对梨园行门儿清的主儿。听一耳朵，便知道这是“梅老板”，那是“麒麟童”。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因此还真不能小看他们。你看这位裹了件大棉袄，双手揣在袖筒儿里，尻头日脑不是？一张嘴，正工青衣，音宽嗓亮，落落大方，地道，梅老板！你看这位鹤骨鸡肤，腰弯背驼，其貌不扬吧，那唱的可是正经的“杨派”，行腔柔稳，清雅脱俗。还真有些老戏迷们听不惯时下剧团里青年演员那两嗓子，总觉不够味儿，专程跑到这儿来过瘾的。褒贬是买主儿，不服不行。

按理，能把这伙儿“戏篓子”“戏包袱”们玩儿转了的人可不是凡人，您得下过几天“海”，至少，也得“票”过几场。要不，人家不服你，镇唬得住吗？不过，在豌豆街的文化站里却是一个例外——在这儿“统领群芳”的，竟是七十出头的老杠夫李忠祥！

李忠祥住在轱辘把儿胡同10号院儿，方头阔脸，声洪如钟，走起路来步子不大，挺胸腆肚收臀，有点儿“外八字儿”，一看便知是当过杠夫的主儿。他毕竟老了，眼角耷拉了，可脸色还是通红的。没错儿，喝大酒喝的，已是杖国之年，可还是像年轻时

一样，性喜自鸣得意。

其实，在这帮唱戏的人中，比李忠祥能唱能演的人有的是。这里有在正经科班里学过的，有在名师门下调理过的，甚至还有正在剧团里当演员的呢。李忠祥呢，当过杠夫，拉过洋车，跑过堂儿，事儿倒干过不少，可没有一件是和唱戏沾边儿的，退休前倒在剧团当门房来着，可那是话剧团。他倒张口“长华”，闭口“长华”的，听那口气，好像他跟那位名丑萧长华不是连襟也是师兄弟。唉，他跟人家萧长华也就是“馄饨交情”罢了。

那会儿他在馄饨铺当伙计，想看戏，又没钱，心里痒痒得猫挠似的，便拎着个食盒儿，里面搁碗馄饨，到戏园子门口生往里闯。“干什么去？”“给角儿送馄饨！”看门儿的竟然信以为真了。常来常往的，人居然认定萧老板演戏时每每要吃这家铺子的馄饨，只要见他拎着食盒过来，问也不问啦。其实，这馄饨哪回也没进了萧长华的肚子。进了戏园子就不见这位伙计了——他找一个旮旯，一边吃了这碗馄饨，一边听戏。用这一招儿，他可听了萧老板不少好戏，连梅老板的戏也听过。这么听，傻子也能喊两口了。他甚至能把萧先生演蒋干时说的那几句苏北话学得惟妙惟肖，让人喊好。所以，现在他也有资格说：“嗨，当年咱们不是穷吗？不是买不起行头吗？要不，咱们早下‘海’啦，今儿个，也‘新艳秋’啦！”他说归他说，内行人一看便知，如果说那位新艳秋天天在戏园子里偷艺，学程先生学得不赖，可比起程砚秋来总还差那么一尺半寸的话，这李忠祥比起萧长华来，可差着十万八千里还得出去了。

不过，李忠祥这性子挺投戏迷票友们的脾气，大伙儿也就跟他逗乐子，称他为“新长华”了，还随带着封给他萧长华在“喜连成”班的职称，称为“总教习”。他本来就喜欢大包大揽，“总教习”尊号既得，更端起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子，真的正儿八经地主起事儿来啦。

豌豆街，特别是轱辘把儿胡同的老住户们对李忠祥是太熟悉了。他当杠夫的时候还年轻，天麻麻亮，就穿上那件绿色的褂子，戴上那顶插着鸡毛的毡帽儿，坐在永安杠房门口的条凳上等差事，路过杠房的人常在那儿和他聊天儿。后来，他又在裕昌馄饨馆当伙计。可没一年，就因为老端着馄饨去“蹭戏”，丢了差事，只好每天早起泡野茶馆，等零活儿干，奔饭辙。后来他搬到了轱辘把儿胡同 10 号院，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。

不过，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，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里，一直破衣烂褂的李忠祥忽然“发”了。其实，说是“发了”，是过分之词，捡破烂儿、缝穷的人们眼浅而已。可那些日子，李忠祥确实不像以往那样饥一顿饱一顿的了，也穿起补丁少点儿的裤褂来了。据李忠祥说，他在野茶馆认识了一位江先生，江先生三天两头儿要扯着他聊天。聊完了，给他一天干活儿的工钱。这对轱辘把儿胡同的百姓们来说，不是让人眼馋的事吗？好烟抽着，好茶喝着，神吹海哨谁不会呀，一天的饭辙就有着落了！人们都说他一定遇上贵人了，今后必发不可。李忠祥倒不认为江先生是什么贵人，因为他很偶然地发现江先生穿的那棉袍的里子也是碎布拼的。可他还是逢人便说自己的纳闷儿：“这位江先生可真怪，

又不是钱多了烧的，干吗要花钱找人聊天儿？”

.....

江先生的确不是什么贵人，李忠祥也没发起来。卢沟桥的炮一响，江先生没影儿了。李忠祥还得去蹲野茶馆等差事，今儿去给人修修门脸儿呀，明儿给人往城外坟冈子抱抱死孩子呀……李忠祥的“奇遇”，也渐渐让人淡忘了。

可解放以后，江先生是贵人的预言倒真的应验啦。那时候李忠祥已经蹬三轮儿去了，那一天在剧场门口等客，天上下了雨，没人坐车，他把车停在剧场的广告牌檐子底下。闲得挺无聊，听见人来人往进场的人说，今儿演的戏说的是杠房的事，他心里一动，反正待着也待着，进去开开洋荤吧！买了张票，进去看看这场话剧，看了半截儿他就愣啦：这演的不全是他跟江先生说的事儿吗？赶快一打听，编戏的可不就是江铁涯江先生，敢情人家现在在是剧院的院长啦！散了戏，他推着三轮儿直奔后台，找江先生去了。江先生还记得他，自然又是好烟好茶招待。李忠祥说：“江先生，我不想蹬三轮儿啦。您不是在这儿当官儿吗？我跟您这儿干得啦！”江先生说：“您能干点儿什么？”“我跟长华那儿偷过两手儿，上台也不慊。”江先生笑了：“那是京戏，我这是话剧。”他说：“甭管什么戏，反正我是喜欢上您这戏班子啦，替咱老百姓说话。让我来看门房儿也行。”就这么着，李忠祥真的当上了这家赫赫有名的剧院的门房。这在轱辘把儿胡同可成了了不得的新闻，据在剧院门口看过他的人说，他这回是真的“发”了。开演之前，穿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，在剧院门口张罗、让

人，和那些从小卧车里钻出来的人物握手，混得可神气极啦！

嗨，还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吧。李忠祥爱说、爱吹，可你听他讲过剧院的事吗？他是置了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，每逢新戏初演的几场，必穿上它在剧院的大门口张罗、让人，和那些从小卧车里出来的人物握手——“欢迎欢迎！”“多多指导！”“您往里请！”……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他是剧院的院长或是本剧的编导，这都是确实的。他觉得这有什么，他是江先生介绍来的，他是给江先生当“门脸儿”来了。所以，他和以前干他喜欢干的事儿一样，欢欢喜喜地忙活起来。可后来他发现，不对啦，剧团里的人拿一种什么眼神儿看着他啊！小青年们拿他“开涮”，叫他“李导演”“李院长”，这倒也罢了，就连江先生好像也嫌他站的不是地方了。每次首演日，当他兴冲冲地换上那身中山装，到剧院门口准备张罗时，江先生总找个话茬儿把他从身边支开。让他去端花盆啦，去看看贵宾室安排得如何啦，一来二去的，他明白啦：穿着中山装，在门口握手、寒暄，那是高雅之人干的事，那不是自己欢实的地方！可他又有几分伤心，莫不是因为自己到那儿站着了，你们就该翻白眼珠儿，在话音儿里掺粉子味儿吗？人哪，得将心比心，替人设身处地。他喜欢剧院，他为它得意。他想起自己是剧院的人，就觉得挺提气。站的不是地方，你们就不能明说吗？别人不知道我，江先生您应该知道我的呀！

知道你？你不能老找着机会把心窝子掏给别人吧？你就是真掏了，人家知道你了，又怎么样？

他四十岁出头才娶了个“二锅头”，没两年，老婆生下德志，

得了产后风，死了。老婆死了几年没续上，说老实话，谁能不动点儿凡人之念呢？更何况每天看着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员。有一天他从楼下走过，听见二楼上水声哗哗，女人的笑声话声传来，他想起这是女浴室，女演员们刚下戏，在洗澡。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么了，走不动了，放慢了脚步，仰起脸儿，看着那扇打开的窗户，好像巴望着从那上面看出点儿什么来，其实什么也看不见。可这成毛病啦，每回路过那楼下，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，仰脖儿看两眼。没想到，不知被谁反映上去了。

大概因为他最服江先生，所以，还是江先生找他谈的话。说真的，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见什么，他要是一口咬定没看，这事便过去了。可他说：“我错啦。我是想看来看，可看不见。”他觉得这有什么，谁能没有点儿邪念？咱不再存这心思就是啦。唉，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，结果呢，整个儿屎盆子给你自己扣上了，反倒给人当笑料儿啦。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员们本来“李大叔”“李师傅”的叫得甜着哪，脆着哪，这一下倒好，全撇嘴啦。小伙子们那话就更损了：“老李头儿，玻璃店里卖镜子啦！”……他们还都是识文断字之人，都是文雅高贵之人呢，他们要是真像人家柳下惠，坐怀不乱，倒也罢了。可他们有的人一边取笑他李忠祥，一边又“搞破鞋”，这不装孙子吗？

李忠祥蔫儿了，再也不像以前，今儿“萧长华”，明儿“杨宝森”了。从这以后，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后老伴儿，如果是以前，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事儿，“成”或者“不成”。可现在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，非把那事儿告诉人家不

可，纯粹是为了考考人家似的。有几个就因此吹了。吹就吹吧，正好。找个娘们儿回家，天天当着你的面，假模假式的装孙子，谁受得了！

“文革”临开始那年，他和剧场卖票的鲁桂英好上了。那年他五十五岁了，鲁桂英五十岁，是个寡妇。别的心思没有，老了老了，找个伴儿，有个说话的人儿，也互相有个照应。两个人平常关系不错，可真把这事儿摊开的时候，李忠祥立刻说：“我得明告诉你，我在剧院里名声不好。有一档子事……”“别说啦别说啦，”鲁桂英打断了他，“八百年前的事儿啦，我知道。再说呢，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，谁还能没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！”

在这之前，因为鲁桂英有仨孩子，李忠祥还有点犹豫，可听了这句话，心里一热，齐啦！这么多年，没人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好像人人都是正人君子，就他是他妈小人！其实，躺被窝儿里摸着自己的心窝子想想，真的就没有一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？……咳，还生这份儿气干什么？这不有一个鲁桂英吗？真能找着这么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当老伴儿，也就不错啦。可是，他和鲁桂英的事到底还是没成。鲁桂英的婆家挑着孙子孙女跟他们的妈妈闹，自然少不了关于他的很难听的话。桂英怕伤他，只是说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也快熬出来了，就算啦。其实，真正原因他已经从别处听到了。

李忠祥老了。“文革”结束那年，已经六十五了，他该退休了。可临到眼前，他又有点儿舍不得了，特别是舍不得那出写杠夫的戏。那是剧院的保留剧目。一听人提起这出戏，他就心动。

虽然他再也不会鲜衣华服，凑到江先生身边，在剧院门口迎宾了，也绝不会再提一句民国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馆找他聊天的事。剧院伤了他的心。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又忍不住干了一次蠢事，又伤了一次心的话，他还想在剧院多待几年，多看几遍那出戏哪。

“文革”中，他是“救”了江先生一命的，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。那时候江先生挨整，报纸上点名，广播里批判，看来是要不得了。有一天他路过康乐酒家（那会儿改名儿了），在大玻璃窗外看见江先生一人在里面闷头闷脑地喝酒，桌上摆了好几样菜。他心说不好，跑回剧院，偷偷写了个字条，大意是说：我们爱您的戏，您想开点儿。扫盲班的文化，多了，他也不会写了。名字他可没敢落上，只好写“革命群众”。写完了，回到饭馆门口，托一个进门的人捎进去了。“文革”后，江先生又上台了，在重排《杠夫》的动员大会上说，因为一个观众的那么一张条子，使他决定活下来了，他说得老泪直流。散会以后，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。当然，他是不会说出那字条的根梢的。又过了些日子，《杠夫》重演了。那天，他忍不住从箱底里找出那身中山装，穿着上剧院了。他早就学会了该往哪儿站啦。他还可能和江院长站一块儿欢实去吗？可江先生啊，他见到了他，打量了他一眼，立刻说：“李大爷，后台那儿缺人。您到后台去照应照应好不？”……

唉，他要退休了。这回，他是一定要求退休了。

现在，他家的墙上，还端端正正地挂着那张红底烫金的“光

荣退休”证书。他还记得剧院为他召开的“欢送大会”，还记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辆“上海”卧车，把他送回了轱辘把儿胡同10号。江先生和剧院的其他领导到他的小屋里坐下的时候，他觉得湿漉漉的泪水顺着脸上的褶子沟流下来了，流到了嘴角上，咸津津的。他不好意思，赶紧给擦了。他开始后悔了。人哪，怎么禁不起一点儿委屈呢？解放前，拉洋车、抬棺材，多少委屈你都得受！可现在，他觉得自己是太金贵了，好日子催的！饱暖生闲事！江先生忙啊，能什么都照应得那么周到吗？能整天琢磨着怎么对你的心思吗？再说了，你站在不该你欢实的地方瞎欢实，就对吗？你存着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，就对吗？

.....

这些，都是旧事了。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们，李忠祥觉着自己这辈子算是快到头儿了。待着吧，吃点儿好的，喝点儿好的，这就算个乐子啦，还有什么？他可没想到，豌豆街那儿竟然有一伙子老哥们儿在那儿吹拉弹唱，在那儿神吹海聊！

那是些扛大个儿的、蹬三轮儿的、卖煎鸡蛋的出身，上不得席面儿的人物，可都讲实理儿，不装孙子。他到了这儿，没三天，又“活”啦！在剧院的时候，他老得留神着，别带出脏字儿来，让人家笑话。说话得留一手，别让人家以为你吹。再往后呢，处处认怂，蔫头耷脑。再说了，人家一张口，都是这个“斯”，那个“基”的，他也不能插嘴啊。敢情该着他欢实的地方在这儿哪！他开始唱，开始聊，开始忙活。唱得挺开心，忙活得也挺开心，好像四十年前那个爱吹爱聊、爱逗爱唱的杠夫又回来